

*Latest Studies of
Social Sciences
of Foreign Countries*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 2003 ·

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308974

C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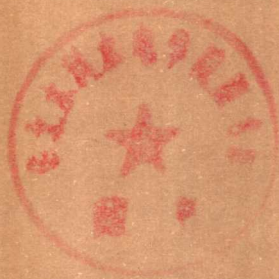
S270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2003

*Latest Studies of Social
Sciences of Foreign Countries*

主 编 王贻志 周锦尉
副主编 莫建备 沈永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7308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2003 / 王贻志, 周锦尉主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ISBN 7-80681-326-8

I. 国... II. ①王... ②周... III. 社会科学—研究—动态—世界—2003 IV. C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1898 号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03)

王贻志 周锦尉 主 编
莫建备 沈永林 副主编

责任编辑: 张广勇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 @ online. sh. 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25.75

插 页: 5

字 数: 66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500

ISBN 7-80681-326-8 / C · 009 定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语

沈永林^①

同世界上任何其他现象一样,科学的存在和发展也始终表现为不断的分化与整合这一矛盾统一的演进过程。从整个发展趋势看,如果说在以往对世界的认识中,感受至深的是各种各样、形式迥异的分化现象,那么,目前这一情况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狭隘的学科界限正在被打破,原本占优势地位的学科内知识综合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日渐为性质不同的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知识门类所取代,而更广泛、更系统、全面综合和高度整合的科学知识领域,比如控制论、系统理论、复杂理论、科学学等,相继形成。这一现代科学的整合趋势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越来越多的相互借鉴和趋同,比如系统方法、结构方法、功能方法、模式方法、信息学方法等,都已成为科学研究的共同手段。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作用的显著提升,也是现代科学强化整合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的一个关键就在于人的问题乃是世界认识整合的主导问题之一。正是由于人文社会科学注重并强化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所以,自然科学先前所具有的那种无可争议的绝对的领先地位才不复存在,与此相应,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也才获得认可与强化。

当社会发展到今天的 21 世纪,国外社会科学在其知识积累的

^①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国外社会科学信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基石之上迅猛发展的轨迹，明显地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社会科学知识成果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具有的全球化、信息化、人性化和生态化的客观倾向，是不可忽视和不容置疑的。

—

20 多年来，全球化使经济、贸易以及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融入全球化必须有一个前提，即不仅仅必须具备文化技能、外语水平等传统意义上的能力，而且要求具有世界开放意义上的观念。如果社会不希望退回到分配的不平等、意识形态的纷争和形形色色的暴力中去，那么它只能以一个和谐的全球知识社会的形式而存在。可是，不受控制的全球化会生成一种无政府状态，对人、社会和市场都可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而且，正是由于全球化了的经济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正在使现存的政治遭到空前的质疑。当然从目前的情势来看，全球化还只是大大限制和削弱了民族国家活动的空间和功能，但还没有达到废除政治的地步。

全球化的进程在历史上第一次创造了这样一个机遇：人们可以越过一切障碍互相交流，携手解决面临的共同问题，一道分享得到的共同福祉。有鉴于此，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家们对于具有全球性的一些问题，正在给予全力关注，比如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民主化问题、反恐问题、文明冲突问题、“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世界财富分配不公问题，等等。所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研究，都使近年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学说更具有全球化的意识。

同反恐战争一样，目前反对毒品、武器、知识、人员和货币的非法国际交易，已成为五场全球性战争。如果说恐怖分子是由于宗教狂热或政治目的的驱使，那么参与这五场战争而与政府和人民为敌的人则是为了获取巨额金钱。这种动力并不亚于宗教狂热，

而且不幸的是，在这五场战争中作为交战一方的政府正在节节败退。这是为什么呢？抛开政府一方本身所存在的观念保守、机构缺陷、经费不足和指挥失灵等传统问题外，正是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全球化形势下，对单一民族国家来说，它得益的是信息革命的成果，更强劲的政治经济的联合以及地理距离重要性的萎缩；但犯罪网络获益更多，它从来都不受主权国家清规戒律的约束，而且目前正在逐渐摆脱地理上的限制。此外，全球化不仅扩大了世界性的非法市场，促进了犯罪网络规模和资源的拓展，而且把更多的负担推给了政府，包括紧缩公共预算、权力下放、私有化、解除管制以及进一步开放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所有这一切使打击全球犯罪的任务变得异常复杂和更加困难，可是毒贩、军火商、蛇头、非法制假者和洗钱人却以高科技手段结成网络，同时还组成了超越文化和国界的复杂而奇特的战略同盟。

当人们正在面对这些全球性问题寻找共同解决的途径时，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和冷战时代的结束，世界上曾出现过两幅著名的关于人类未来的图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福山设想，可能会发生全球资本主义的传播，继之是自由主义的传播，结果将出现一种新的普遍主义，一种单一的全球文化。与此同时，亨廷顿所设想的未来却截然相反：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而资本主义全球化将导致一种反向运动，即由于人们对文化的忠诚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这种忠诚的再现必将导致文明的冲突，从而将出现一种新的部族主义。

这两位思想理论家谁是谁非，很难简单地给予结论，但有一点却是非常现实地存在着的：一方面，全球化的经济正在将世界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种全球化的文化之中；另一方面，文明和宗教的差异也正在迫使世界相互分离。不过，福山和亨廷顿的理论在解释全球化的新特征时，几乎都陷入了某种困境，从而引来了众多的质

疑和批评,特别是“9·11”事件以后,国际社会亦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危机状态。所以,福山和亨廷顿也各自发表补充性说明文章,对新的现实情况给予新的解释。在这一背景下,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雷德曼为代表的“全球化乐观论”便应运而生。他把全球化看作是“黎明前的曙光”,并全力促使公众能意识到全球化的逻辑正是“和平与民主”。

然而,当代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却在《外交》杂志2002年7/8月号上发表《全球化的冲突》一文,认为全球化的现实生活反映的并非是“全球化的乐观”,而恰恰相反,是“全球化的冲突”。首先,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和平与民主;其次,全球化的结果并不像所宣称的那样完善;第三,全球化对国际政治产生冲突性影响;第四,全球化使跨国恐怖主义成为可能。

在关于全球化的研究中,学者们还注意到了——一个严肃而现实的问题:美国在谋求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必将实行军事扩张战略。目前,美国已经在全球建立起一条军事基地和军事集结地的链条,以便在紧急状态下部署其海军和空军,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其政治和经济霸权的需要。美国军事力量的全球性,正是其经济全球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的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和金融活动,都迫使其需要全球性的军事力量来保驾护航。

由于全球性的共同问题越来越多,这不仅引起了社会科学界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兴趣,而且还引发了社会科学家们的共同的行动。2003年5月31日,这是一个平静的周末,但在一如往常的欧洲大地上,却迎来了欧洲思想界的一次轰动之举。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法国的《解放报》,瑞士的《新苏黎世报》,意大利的《共和国报》、《新闻报》和西班牙的《国家报》几大欧洲重要报刊,一同发表了七位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著名思想家、艺术家和文学家的文章,他们是德国的哲学家哈贝马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瑞士作家穆希勒、意大利符号学家

兼作家艾柯、西班牙作家萨瓦特、意大利理论家兼欧洲议会议员瓦蒂莫以及美国哲学家罗蒂。文章的主题鲜明而统一：主张一种多极世界的观念，要求加强联合国的地位，呼吁欧洲必须在政治上实现一体化。他们的口号也是惊人地统一：（首先是全欧洲然后是全世界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充当反对美国霸权的急先锋。文章一经发表，欧洲上下乃至整个世界反响强烈。据媒体介绍，近期还将发表更多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名家的重磅文章，以推波助澜。这充分反映了知识界关注全球问题的态度和介入政治的决心。

二

在信息科学基础中，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极为重要，但信息科学绝不仅仅局限于此，它也与许多领域的人文社会科学密切相关。今天，科学的“人文化”正在呼唤人们用更加开放的观念来研究信息科学的问题。信息科学的多面性、复杂性、内部矛盾性，都已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和讨论的侧面，从而使社会科学研究形成了一种信息化的趋势。实践证明，信息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极其广泛和重要的意义，于是，“信息与人”、“信息与社会”、“信息与文明”等研究方向便由此产生。

承认社会实践在人的生活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正是普遍流行的哲学观，这也意味着应该关注社会信息过程和一切与文化动力学相关的现象。正是在这种前提下，种类、特点和表现形式极为多样化的社会信息才成为哲学研究的特殊对象，又由于哲学与一般社会科学的紧密联系，所以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都对各种社会信息过程、信息关系、信息特征进行着长期深入的研究。

利用哲学、政治学、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法学理论及其他社会科学方法分析社会的现实结构和社会各层面的功能，有助于深刻理解社会信息的特征和作用，也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才能有

效地研究科学发展、信息活动的结构和系统的规律性与关联性。科学信息、技术信息、工艺信息,都是一般社会信息系统中的专业信息,其功能和发展深化机制自然也与其他许多社会信息现象相互关联。这就说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对于信息科学具有特殊意义。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对信息在个人和整个社会生活中作用的认识不断增强,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已经或正在成为研究的对象,比如,近年来对信息交流工艺的发展、国际互联网及其对个人和社会群体信息空间的影响、国家发展信息法律问题、信息安全问题以及信息社会向智能社会转化的前景问题等,都引起了研究者的特别关注。

由于信息交流工艺的飞速发展,目前,介于信息学与文化学之间被称作信息学动力的问题正初露端倪,也就是将人与社会的信息文化作为一般文化的一个特殊层面分离出来加以研究。这正是由于社会信息过程和人类信息活动急剧集约化的结果。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信息文化既与社会的物质文化有关,也与社会的精神文化相联。所以,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在参与社会信息过程时,无疑均具有心理属性,这就产生了一种信息自由的需求,也就是信息的知情权。

作为全球化的结果之一,信息自由这个概念的本身正在发生变化,过去纯粹只是从道德上对保密进行指责的一种概念,而现在却包含有价值中立的含义,即充当市场、调控、提高政府效率、促进经济和信息产业发展的一种形式。目前,世界上有26个国家正式立法,使公民有权了解政府的信息。据资料显示,2001年,也就是日本知情法律生效的第一年里,公民就提出了4000多项请求。在泰国知情法律颁布的最初3年中,就有50多万名公民应用过相关条文而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如今,世界上不少多边机构都在努力应付和解决来自成员国或市民社会的知情挑战;在欧洲,瑞典、丹

麦、芬兰等国正在批评德国和法国的保密文化，世界银行也不得不执行披露信息的政策。

国际信息自由运动充分利用了道德与效率的双重要求，于是就涉及到改革民主管理的问题。这一运动对任何被称为民主制的政府提出了新的规范、新的预期和新的要求。与此同时，一些封闭的国家利益集体继续发动猛烈的反击，援引国家安全和隐私的需要，作为反驳信息自由的论据。所以，信息自由运动的最大障碍，也许正是政府和民众都要适应一种新的文化和心理氛围：信息并非国家所有，而是公民所有。

值得一提的是，在信息学和计算机理论与实践等领域，一个新的交叉学科正悄然兴起并获得了迅速发展，它不仅对不断出现的新的伦理问题（信息开发、信息传播、信息管理和利用等方面的伦理要求、伦理准则、伦理规约等）作出了界定和解释，也提供了初步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最初的以计算机伦理学面貌出现的信息伦理学。

信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今天，当一些人在拥有高新的数字手段遨游于那个虚拟世界的同时，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还有一些人根本不拥有任何信息，也不具备任何手段。信息作为一种资源，也有贫富差距，这就出现了人们所说的“数字鸿沟”。在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国家和地区，那里没有电灯，也没有电话，更谈不上使用电脑了。这些地区的人们不但物质上贫穷，精神上贫穷，信息资源也极其贫穷，信息社会离他们还很遥远。这一状态同财富的不平等一样，绝对有碍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三

在当今世界上，科学和技术的高度发达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经济的发展又推动了政治的民主，一个新的文明时代正在降

临。但是，一些地方的情况并不容乐观。与流行的看法相反，奴隶制并未从世界上消失。大量的事实表明，现代奴隶制正在不断扩展，受奴役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它犹如一张张蜘蛛网充斥着整个世界，而且往往又被一般经济剥削的阴暗现象所掩盖。然而，现代的奴隶制并不仅仅是一种极度形式的剥削，它具有其普遍的特征，从而成为当今社会科学面临挑战的难题之一。也正因为此，当今的社会科学在研究类似的社会难题时，总是把人放在首要地位来加以对待，以维护作为人所应有的基本权利，从而也使科学研究的本身更具有人性化的特点。

尽管奴隶制曾经是人际关系最古老和最持久的形式之一，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从法律政治意义上说，它已经不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然而许多迹象表明，债务奴隶和其他形式的奴隶制在 21 世纪的今天仍然存在。据资料，今天世界上受奴役的人数差不多达到 2700 万之众。事实表明，贩卖人口已成为社会的一种巨大忧虑，特别是在欧洲和东南亚地区。这是由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实施的国际间非自愿的一种人口走私。在一些地区，比如南亚和北非，奴隶制是一种从未真正终止过的千年传统。这一情况引起了各国政府以及诸如梵蒂冈、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和大赦国际等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的关注，众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也在通过严密的社会科学调查，对现代奴隶制这一现象进行研究。

一个常见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奴役他人的行为应该称为奴隶制，而不仅仅只是一种形式的极度剥削？回答是极其简单的：从历史上考察，奴隶制意味着在暴力的支持下失去自由的意志和选择，而这种暴力有时是由奴隶主实施的，有时则是由政府部门实施的。虽然处于经济阶梯最底层的工人从一开始起所具有的选择权就屈指可数，但在整根剥削链条的某个地方，甚至连这屈指可数的选择权也会丧失。

现代奴隶制的普遍特征之一就是奴隶价格的下跌，正是这一

点,不仅改变了奴隶制的利润可获率,也改变了奴隶与主人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心理控制,尽管现代的奴隶几乎都知道他们的受奴役是非法的,但势力、暴力和心理压力都迫使他们接受奴役。很明显,真正的奴隶解放是发生在心中的,仅仅人身自由还是不够的,精神自由才能带来人身自由。有关现代奴隶制的方方面面,都已成为“奴隶经济学”面临的难题,但不应忽视,对现代奴隶制研究正在引起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争议。

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美国校园内发起了一个“反血汗工厂运动”。学生们不仅关心当今世界上血汗工厂的状况,而且希望结束这种亵渎人类尊严的野蛮状态。可是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尽管血汗工厂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但其在发展经济和减轻贫困方面却起到了积极作用。2002年1/2月号合刊的美国《挑战》杂志刊登沃顿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约翰·米勒的文章对经济学家们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分析评论,并指出,尽管血汗工厂对经济的发展会带来某些积极作用,但作为发展中国家,不应该轻易容忍它的存在。

主流经济学家们基本上坚持不干预市场结果的立场,虽在情理之中,但却令人失望。他们对血汗工厂的某些观点尽管会有些真理,但未免以偏概全。首先,他们的命题立足于交换的角度,模糊了血汗工厂的压迫实际。其次,他们认为不乏政府法规影响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将会自行结束血汗工厂的状况。最后,他们断言,改善全球出口加工工厂条件的要求会伤害第三世界国家的工厂工人,妨碍减轻贫困的进程。这些看法完全歪曲了历史事实,是没有理论根据的。

支持“反血汗工厂运动”的经济学家并不否认这样的事实,即发展中国家许多人的境遇比出口加工工厂的工人还要悲惨。但这并不说明,雇主与没有多少选择权的工人之间的交换是真正出于自愿的,也不说明出口加工工厂就不是剥削的场所。这是一种“无

奈的交换”，是一种“绝望的交换”。

有人说，血汗工厂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确实，以往经济的发展都经历过血汗工厂阶段。19世纪初的英国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就存在过血汗工厂，只是后来才产生许多社会立法来摆脱这个瘟疫。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世界重走这条老路。在世界普遍贫困和全球经济不平等日益拉大的情况下，只有所有人的境遇都得到改善，全球更多的工厂岗位对穷人来说才不是浮士德式的契约，而是的确的确的好消息。

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性化特点不仅仅表现为关心那些受剥削受奴役的人群，而且对提高人的生活质量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如果说，以抗击美国文化的侵入为标志的欧洲“慢文化”的兴起引起了社会科学界的重视的话，那么，目前欧洲的快乐研究正在成为一种政治时尚，而其领军人物之一正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丹尼尔·卡纳曼。今天，人类比20世纪50年代时富有得多，可是人们并不比那时更快乐。原因就在于，把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安康尺度的理论具有严重的缺陷。快乐研究指出，作为一个社会的发展标准，不仅包括财富水平，而且包括快乐水平，这就是“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

提出快乐研究的背景是，西方发达社会正面临的问题：物质已从匮乏转向了过剩。现在，人们生活在这种剩余经济之中。也许，历史上人类总是为之奋斗的生存问题已不复存在，但就如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言，人类真正的永久问题是如何利用其摆脱了紧迫的经济担忧而自由、和谐和幸福地生活。一个由物质匮乏向物质过剩社会的过渡证明了凯恩斯的预言不无道理。虽然近来的经济急速发展可能极大地提高了总体的繁荣水平，但这种繁荣并不能使人们的快乐感得到相应的改善。

其原因之一是，繁荣增强的利益未能得到平等的扩散，即使在西方富国，大量的人仍生活在贫困之中，而更多的人也只能量入为

出。其次，可以用行为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给予解释：人的动机的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只有处于需求金字塔的顶端，这时一个人因为可以做其能够做到的一切才会感到快乐。

金钱作为满足快乐的先决条件是非常重要的，但经济的繁荣并不是更大快乐的关键。事实上，国内生产总值与快乐之间并无真正的关联，其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这种标准所衡量的只是以货币价值体现的东西，而不能体现一旦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对其变得更为重要的东西，比如对许多人来说，时间已变得如此宝贵，以致常常被称为“新货币”，然而国内生产总值是不包括时间的。更为重要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往往把实际上使人们变得更为苦恼的东西计算成收益，比如由于犯罪的上升，监狱系统、防盗系统、枪支弹药等开支就会增加，这些会对国内生产总值作出贡献，可是人们总会觉得不安全，所以人们的快乐就会减少。

于是，一种新的衡量指数便应运而生，即把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核心数字，再根据有损安康的经济“缺陷”的假设代价对其进行调整，这就是“可持续经济指数”，最初由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和神学家约翰·科布提出，它把私人消费开支作为基本数字，再把不支薪金的国内劳动力价值包括其内，但扣除许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被视为正面因素的数字，还必须扣除收入差异，并把与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的代价相关的假设数字作为计算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能够对快乐作出“衡量”，那也必将会制定出最大限度地增加快乐的政策，而快乐也极有可能成为一种政治时尚。

四

数十年来，人类十分深刻地意识到了20世纪产生的那些全球性问题的尖锐性、地球生态恶化的严重性，以及今天仍标志着世界

文明程度的那种生活方式如此不明智地继续下去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危险性。那么,出路何在?从实质上说,最终的一切都在于人类的素质。如果人类自身没有足够的智慧和竞争力,不能果断而明智地减轻对大自然的压力,不能明显地限制和减少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能优化人口素质,不能有效地减少社会群体间的冲突,不能最终从根本上铲除战争,不能使世界经济结构和经营战略全面合理化,那么人类的前景将是悲惨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在经过了多年的关于未来的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的争论之后,才逐渐形成了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化构想。

在科学层面上,正是在这一阶段形成了社会生态学或人类生态学这样的新兴交叉学科。就该领域的研究目的、对象、内容和方法而言,都有别于纯生物学那样传统的自然科学学科。不过,社会生态学与人类生态学也不完全相同,后者只是把人视为一种活动的、重要的生物加以研究,而前者却鲜明地揭示出人的自然属性的社会原理。实际上,这就是社会的人类生态学。这样,这门新兴的人文社会学科所关注的核心就是一个“人——社会”的生态系统,所研究的不仅仅是个体的人,而是在社会整体层面上进行探讨。

现在,生态常识已经无需更多的解释而进入了日常的大众意识和生活实践之中,在这一现象的背后隐含的实质正是社会意识的逐步生态化,其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科学的“生态化”,即用社会生态内容充实各种科学领域,并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建立社会生态问题就是为人类的继续生存创造优越条件的问题。所以,需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门类的携手合作和相互作用。今天,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不仅仅是自然生态的不良所造成的。应该说,战争危险、热核危险、国际恐怖主义、宗教纷争、民族隔阂、社会犯罪、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发达地

区长期存在并不断加剧的落后状态,等等,都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非常严重而且非常严肃的生态问题,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同自然资源的日趋减少、生活环境的日趋恶化一样,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安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更何从谈起?

于是,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探讨与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坚持不懈的执着目标。与一个人总是具有私欲和内在的侵犯性一样,美国就是这样一些具有强烈侵犯欲望的国家代表。在当今所谓的“后冷战时代”,美国在对外关系中一贯坚持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又引申成为“新单边主义”,即主张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强权的同时,也表现出仁慈;主张美国应超越狭隘的自身防卫,而追求全球目标。所谓表现出“仁慈”,依然是山姆大叔一贯的“大棒加胡萝卜”的翻版,而追求“全球目标”则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加快推进美国式的民主进程和价值观体系。近来,关于美国的“新帝国论”又粉墨登场,其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这一切无不证明,当今世界战争的根源就在美国。从根本上说,它的过度的对外扩张会导致自身力量的削弱,它的帝国追求也会导致内部的衰败。

“9·11”事件产生了许多许多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在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恐战争的同时,一个关于贫困与极权之间关系的老话题又重新被拾起。不少人认为,滋生恐怖主义刻毒与仇恨心理的条件与贫困和不公密切相关。于是,贫困与恐怖主义存在联系观念引起了一阵对全球阶级冲突的普遍惊恐。但是如何解决贫困问题呢?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002年夏季号发表专栏文章认为,贫困直接导致恐怖主义的结论显得肤浅;令人信服结论应该是: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对社会和个人权力预期的不断增强,刺激了极权主义和暴力行为。所以说,不良政府才是贫困的政治根源,如果不解决不良政府的问题,缓解贫困的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这就是专制制度的经济逻辑。

谈到世界的贫困差距以及不发达地区的落后状态,不少研究

成果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据美国《纽约书评》2002年8月15日载文称,世界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克林顿总统经济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其新著《全球化及其不满者》中,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实践知识以及完全超然的心态,对当前一些极为重要的论题进行了全新角度的探讨。他指出,在信息不完整和市场不完善的时候,那只“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完满的,而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为了应对经济发展的挑战,往往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然而,它所扮演的却是发展失败故事中的一个反面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提供的政策建议包括财政紧缩、高利率、贸易自由化、开放资本市场、私有化等,然而所有这些政策在信息和市场还都存在缺陷和不足的情况下,不仅不能带来积极的结果,反而会招致危险的灾难。其根源就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依据的是一个错误的信念:听任自由市场发挥作用便可自然而然地解决一切问题。这不仅是该机构的一种偏见,而且是更深层次的道德缺陷的反映。缺乏对穷人的关心,这是一个价值观念问题,归根结底正是“意识形态与不良经济学的一种奇怪结合”。

实践表明,财富的不平等绝对无助于经济的发展,还会导致民主价值观念的不断弱化。此外,人口问题、移民问题、城市问题、艾滋病问题、女权问题等等,都作为社会生态问题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度关注。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民族也总是要有一种精神的。只有在国际社会的层面上,寻求共同协调的发展,这个世界才会迎来和平与繁荣。

五

2003年版的《国外社会科学前沿》正是基于以上四方面的发展趋向而架构的,在反映国外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前